

魏源与西学东渐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彭大成 韩秀珍 著

湖南师范大学『十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论丛

魏源与西学东渐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彭大成 韩秀珍 著

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研究
及湖湘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库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源与西学东渐——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 彭大成, 韩秀珍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81081-524-5

I. 魏... II. ①彭... ②韩... III. 魏源(1794~1857)—思想评论 IV. B25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434 号

魏源与西学东渐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彭大成 韩秀珍 著

-
- ◇丛书策划: 刘苏华
 - ◇组稿编辑: 刘苏华
 - ◇责任编辑: 刘苏华
 - ◇责任校对: 全健
 -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www. hunnu. edu. cn/press
 -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 ◇印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
- ◇开本: 670 × 960 1/16
 - ◇印张: 32. 25
 - ◇字数: 526 千字
 -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1—1000 册
 - ◇书号: ISBN 7-81081-524-5/B·019
 - ◇定价: 49. 80 元
-

目 录

上篇 魏源的生平与思想轨迹

第一章 勤奋早慧的湖湘英才 / 1

第二章 交游天下的“无双国士” / 8

- 一 广交天下英杰俊彦 / 8
- 二 遍游祖国名山大川 / 34
- 三 辛勤耕耘著述等身 / 38

第三章 佐幕两江的改革智囊 / 42

- 一 漕政改革 / 44
- 二 盐政改革 / 50
- 三 治水之策 / 60

第四章 千古变局中的前驱先路 / 71

- 一 追源溯本, 力主禁烟 / 72
- 二 关心战局, 亲赴前线 / 76
- 三 创榛辟莽, 前驱先路 / 93

第五章 凄风苦雨的暮年仕途 / 123

中篇 魏源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

第六章 在中西发展对比的历史坐标系上 / 140

- 一 西方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 / 141
- 二 中国封建社会的日暮途穷 / 160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者 / 186

- 一 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阐发 / 187
- 二 对道家及其他各家学说的吸收与发挥 / 198
- 三 对释氏佛学的继承与吸收 / 208
- 四 魏源的经世思想及其湖湘特色 / 218

第八章 西方先进文化的首位推介者 / 244

- 一 高度关注西方各国发达的社会生产与通商贸易 / 245
- 二 大力宣传西方各国先进的教育事业与科学技术 / 257
- 三 批判西方的宗教信仰,肯定西方的社会文明 / 268
- 四 热烈赞扬与宣传欧美的民主政治制度 / 276
- 五 对世界其他各洲、各国情况的介绍 / 289

下篇 魏源与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及其比较研究**第九章 魏源思想与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 / 299**

- 一 “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曾国藩 / 301
- 二 “一身任天下之重”的左宗棠 / 314
- 三 中国近代第一位驻欧使者郭嵩焘 / 333
- 四 洋务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 / 365

第十章 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 / 394

- 一 魏源思想与日本近代的明治维新 / 395
- 二 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 / 405

结束语 述往戒今,居安思危,迎接 21 世纪的新挑战 / 476

- 一 永葆中华民族谦虚学习的精神 / 478
- 二 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 / 484
- 三 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 491
- 四 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 / 499

参考文献 / 505**后记 / 508**

上篇 魏源的生平与思想轨迹

第一章

勤奋早慧的湖湘英才

1794年4月23日(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诞生在湖南邵阳隆回县金潭乡。这是一个群山环抱、交通不便的偏僻山村。一条叫金水河的小河由北向南从村前流过,滋润着这片土地,使这里更显得山清水秀、草木葱茏。

明代以前,这里还是瑶族人居住的蛮荒之地。明初设宝庆卫,建隆回巡检司(今司门前)以统治瑶人,并从江西移民至此屯田戍守,下设八都,金潭乡属于一都。据魏源的儿子魏耆在《邵阳魏府君事略》中说:“先世江西太和县人,于明初迁湖南邵阳之金潭。”^①到魏源时,魏氏一族在此已定居300多年。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7页。

魏源的曾祖父名大公，字席儒；祖父名同，字孝立。魏源的父亲名邦鲁，字钟毓，一字春熙。魏邦鲁“性慷慨，好读书，喜游览。所至，交其豪杰。嘉庆初，以巡检分发江苏，历署嘉定诸翟司、吴江平望司，力行乡约，平争讼，课生童，皆著廉惠”^①。特别是在荆溪张渚司、海州惠泽司任上，魏邦鲁捕缉盐枭、盗匪，兴办义仓、社学，赈济灾民，政绩斐然，受到其上司江苏布政使林则徐、贺长龄、梁章钜与江苏巡抚陶澍的奖励和赏识，于道光十一年（1831）卒于宝山水利主簿任上。魏邦鲁虽然终生只是一名地方小官，但是他的廉政与勤政为他儿子日后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关系网络。

从魏源的家世来看，应属于中小地主阶级阶层。其家乡金潭虽然地处偏僻，但土地肥沃，盛产稻谷、棉花。那条名叫金水河的小河中还产金砂（笔者于1985年参观魏源故居时，还看见有淘金者在此淘金，当地已出不少“万元户”），因此，这里商品经济在300多年前就已比较发达。据《邵阳金潭魏氏族谱》（未刊稿）说，魏源曾祖“除收租外，并服贾经商，财源称意”；祖父“承其家业，家颇饶裕”，以至能修万石谷仓。只是到魏源祖父孝立公时，“值大饥，有司责赋急，合县惊骚，几至变。孝立公慨然赴县，毁产代输，邑众以安，家亦中落。春熙公因筮仕江苏，道远不能顾，益窘”^②。当时遇上大灾之年，饥民遍地，几乎酿成民变，魏源的祖父慷慨地捐献自己的家产，开仓济贫，才安定隆回的饥民，因而造成魏家的中落。再加上魏源的祖母匡太恭人年迈体衰，重病缠身，饮食起居不能自理，全靠魏源的母亲陈太恭人一人照料，“哺甘涤秽，数年如一日。夜则燃豆秸，母织子读，欣然忘贫”^③。可见，魏源幼时的生活已比较拮据，艰苦的生活培育了他艰苦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

相传魏源出生前夜，他的母亲陈太恭人梦见一个头戴古冠身穿古衣的人，手中拿着一枝巨笔及一枝金色花送给她说：“这是送给你的儿子的。”梦醒之后就生下了魏源。这虽然只是一个梦，但是足见魏源的父母对他自幼所抱的殷切期望，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以文章取功名、成大器的伟人奇士。

魏源“幼寡嬉笑，常独坐”^④。这说明魏源儿童时代并不活泼好动，

① 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1页。

②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7页。

③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7页。

④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7页。

而是喜欢一人独坐默思。他的祖父孝立公对他十分喜爱,经常对家中人说:“这个孩子的性格、相貌并不寻常,不要用对一般儿童的要求来培养他。”魏源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入家塾读书。与一般小孩不同,他一接触书本就能大致理解书中所宣讲的儒家大义,而不是机械地识字和死背、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填鸭式”教育,因而能够被书中的道理深深吸引,自觉而刻苦地投入书山学海之中。由于长期闭门读书,很少出来,连家中与邻居的狗都不认识他,偶然出门一次,都要引来群犬对他狂吠。他经常手捧书本,从深夜读到天亮。他的母亲见他太过勤奋,便规定他每到夜深就必须熄灯睡觉,但他等父母睡熟之后,又重新点灯,蒙上被子在床上偷偷看书。这种情况不久后被母亲发觉,母亲心痛地劝告他说,这样长夜苦读,不是儿童所能吃得消的,劝着劝着就止不住眼泪双流。这样,魏源才开始稍微注意休息。9岁的时候,魏源去县里参加童生考试,县令在点到魏源的时候,见魏源年幼可爱,指着茶杯上画的太极图,即兴出了一句上联:“杯中含太极。”这时魏源衣袋里正好装有两个供充饥用的麦饼,灵机一动,随口对出了下联:“腹内孕乾坤。”县令大吃一惊,说:“此子如此聪明,将来必成大器。”

魏源幼时曾拜金潭的刘之纲先生为师。这位刘先生虽是饱学之士,但“为文奥衍,屡试不第”,终生居住在金潭刘家大院里。魏源成年离乡之后,每次回乡探亲,都必定拜谒这位私塾先生。魏源于15岁时“补县学子员”,即中了秀才,开始研究王阳明的学说,并好读史书,因家贫无书,时常向家族私塾借书攻读。他的伯父坦斋公认为这不是少年猎取功名的必修课,禁止他涉猎过于杂泛,但他还是“伺便写读”。魏源17岁补为廪生,名声益广,即正式开馆授徒,前来求学的弟子接踵而至,源源不断。

嘉庆十八年(1813),20岁的魏源“举明经”,“始为拔贡”。主持这次湖南拔贡考试的就是后来号称“相国”的内阁大学士汤金钊(1772~1856,字敦甫,号勋兹,浙江萧山人,曾任礼部尚书)。1814年,魏源陪同起复的父亲春熙公一道进京。这是魏源生平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首都北京,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

在魏源此次入京的前一年,河南、山东、直隶等省遭遇大旱,民不聊生,饿殍遍地。天理会乘机起事于直隶长垣、河南滑县、山东定陶与曹县等地,攻城杀官,狼烟四起。天理会总教主林清等人指挥徒众直攻北京紫禁城,给清王朝造成前所未有的震撼。这年12月,又发生了陕西岐山县饥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最终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但对“承平日

久”的清王朝无疑敲响了严重的警钟！

魏源这次入京，历经湘、鄂、豫、冀四省，沿途所见的苍茫大地、巍巍群山、大江大河与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古迹，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激情，开拓了他的胸襟与视野。他在《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中发出了这样深情豪迈的咏叹：

胡为别戚爱，登此万里途。疏者日以亲，亲者日以疏。出谷水赴壑，出石云弥虚。扶疏干去土，学习巢辞雏。皇都象北极，万辰所拱趋。群材龙凑海，文献日丽衢，海大水变化，日丽云昭苏。足不九州莅，宁免井蛙愚。尼父咨柱下，吴札观周书。

客行梁宋道，言访梁宋迹，欲寻史上踪，十九无一获。浊河决千里，一淤辄寻尺，屈指三千年，几决几淤积。每有浚濠人，十仞逢麓脊，沙覆中天台，尘掩兔园宅。当年歌舞馆，下隔黄泉百。当年龙战垒，上有河声渚。陵谷复陵谷，太息重太息。

何者送我行，终日太行山，宇宙苟无此，岂不旷且闲。我心有太行，嵯峨万古间。信陵函谷召，岳帅朱仙班，椎误博浪沙，星陨大散关。尔朱犯洛都，骑渡盟津湾，决河灌贼营，阖汴鱼龙淹。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西日不东逝，东海不西还，欲平五岳胸，何异北斗南。

千里河南北，高下寸地无，岂其扶舆气，磅礴为平芜。缅怀画井世，畎浍兼沟涂，经纬备潦旱，纵横资泄储。一经阡陌辟，屡值黄流潴。谁言尽地利，地利弥有余。西北仰东南，吴越穷挽输，四水会汴梁，雄丽甲中都。一艘今不达，并枯贾鲁渠。沧桑隔唐宋，何况秦汉初。旅客有奇梦，梦游古华胥，手持水利书，副以沟洫图，拜献神禹前，冀免斯民鱼。^①

另一方面，魏源对中国北方战乱之后的满目疮痍、人民遭受巨大灾难的严酷现实，也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与悲愤。他在这一同组诗中吟道：

滑台阻运河，距卫百里圻。去岁大兵后，大稔今苦饥。黄沙万殍骨，白月千战垒。至今禾麦地，极目森蒿藜。借问酿寇由，色哽不敢唏。野店象纬逼，三垣拱太微。孰称中执法，孰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76～577 页。

峙钩陈墀？孰扈雨林蹕，孰专喉舌司？分野错三辅，煌煌燕豫齐。鼎峙岳牧伯，胡耀橈枪旗？彗贯紫微垣，水溃银潢堤。孰分真宰忧，号令丰隆驰？我欲叫阖闾，阖闾苍莽垂。匏瓜不可摘，高舌挂南箕。

中野种荞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秀，三月花如银。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投之北邙坑，聚土遂成坟。明年土依然，春风吹麦新。勿食荞麦花，复作坑中人。

夙抱山可情，每结烟霞约，一来河南道，十里惟广漠。更无山水青，惟有水长浊。奈何殷盘庚，五迁不归亳？缅惟中条内，代有仙灵闾托。云飞少室鳧，月送缙山鹤。盘企太行谷，泉忆苏门崕。均非车马历，徒使中情跃。瘁哉邹鲁圣，轍环梁宋郭，泗外不知津，岱外未升岳。竟因悲悯怀，负此仁智乐。八载门不入，禹岂耽丘壑。至今櫟橈地，明德照河洛。^①

这是魏源第一次远离家乡、千里跋涉，考察沿途的山川地理、风土民情的纪实诗，表现了魏源不愿作井底之蛙而要一飞冲天、极目神州的博大胸怀与心忧天下的高尚情操。全诗也体现了魏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社会调查、关心民生疾苦的渊博历史知识与敏锐政治目光。这是一组既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又充满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政治纪实诗。诗中所描绘的“去岁大兵后，大侵今苦饥。黄沙万殍骨，白月千战垒。至今禾麦地，极目森蒿藜。借问酿寇由，色哽不敢唏”，“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冀此顷刻延，偿以百年嗟”的悲惨景象，是魏源亲眼见到的严酷现实，真实地反映了嘉庆年间天理会农民起义前后的社会图景。对此，魏源不禁大声发问：造成这一悲惨社会图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魏源也不能或不敢正面回答，只能发出“借问酿寇由，色哽不敢唏”的哀叹。他虽然一时还不能找到解决这一严酷现实问题的正确答案，但他已决心为解决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而贡献自己的满腔热血与毕生精力。他要仿效古圣人为天下百姓而终生不渝地奋斗：“竟因悲悯怀，负此仁智乐。八载门不入，禹岂耽丘壑。至今櫟橈地，明德照河洛。”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77 页。

从地处湘西南的偏僻山村来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无疑为魏源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交舞台和更高级的求学场所。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不仅集中了朝廷的高官大吏,汇集与传达着全国最重要、最敏锐、最及时的政治信息,也聚集了全国第一流的学者与思想家,是全国各种文化知识最丰富的集中地。这里也有全国最丰富的官私藏书和政府文件。这对于年方二十出头、精力充沛、求学如渴的魏源来说,无疑如鱼得水。他很快像蛟龙一样游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无边无垠的知识海洋,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京城的拜师求学之中。

在留居北京期间,魏源首先向胡承珙先生[1776~1832,字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嘉庆十五年(1810)任广东乡试副主考官,寻迁御史,转给事中]学习汉儒家法;同时“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学塏,学《公羊》于刘申受先生逢禄,古文辞则与董小槎太史桂敷、龚定庵礼部自珍诸公切磋焉”^①。在上述师友中,姚学塏(1766~1826)系浙江归安人,嘉庆元年(1796)进士,曾任贵州省乡试主考,后转兵部主事,迁职方司郎中;刘逢禄(1776~1829),江苏武进人,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董桂敷,安徽婺源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任翰林院编修。这些人都是当时颇有声望的大学问家,是在湖南偏僻乡村中难得一见的人物,向他们当面求教学问,无疑大大扩充了魏源的知识视野,打牢了他的学问基础。特别是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更是日后与魏源齐名、被并称“龚、魏”的大思想家。他们之间的切磋交流,进一步提高了魏源的思想境界,丰富了他的知识与阅历,激发了他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

在京城结交的师友当中,时任内阁大学士(清朝的内阁大学士被尊称为相国)的汤金钊是魏源在湖南考取拔贡生的座主(主考官)。按中国封建社会学界士林的规矩,这是一种名正言顺的师生关系,对魏源未来的功名与仕途都十分重要。所以,魏源到北京后同这位相国大人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时常登门拜访、问候请教。但是,为了攻读《大学》古本,弄清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魏源曾有50多天不曾拜访这位文端公。这位汤相国以为魏源生病了,亲自到魏源的住所去探望他。魏源急忙蓬头散发、“垢面出迎”,弄得相国大人十分惊愕,及至魏源将他攻读《大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8页。

学》的读书心得拿出来交给汤相国阅看,汤相国“瞿然叹曰:‘吾子勤学罕觐,乃深造至此,然而何不自珍爱乃尔也!’”^①由此可见魏源刻苦求学到了何种忘我的境界!

辛勤耕耘,终获报偿。魏源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26岁时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于道光元年(1821)28岁时再次考中顺天乡试副贡生;于道光二年(1822)考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号称为“南元”。长达20多年的寒窗苦读,终于为魏源步入仕途造就了一个现实的台阶。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8页。

第二章

交游天下的“无双国士”

一 广交天下英杰俊彦

魏源中举之后并没有很快中进士,而是在举人与进士的功名之路上坎坷蹉跎达 23 年之久,直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52 岁时才中了进士。但是,魏源并未虚度这段漫长而宝贵的岁月。这期间,魏源在发愤苦读、辛勤著述的同时,也开始了他漫游天下、广交四方英杰的游学生涯。

应该说这种游学生涯从他 20 岁第一次进北京时就开始了。在进京旅途中,他结交的第一个重要朋友就是湖南新化人邓显鹤[1777~1851,字子立,又字湘皋,嘉庆九年(1804)进士]。邓显鹤比魏源年长 17 岁,是湖南著名学者,也是道光年间第一次刊刻《船山遗书》的主编。他还是湖南文献的积极搜集者与编纂者,曾主编过《沅湘耆旧集》200 卷,为传播与弘扬湖湘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受到曾国藩与梁启超的高度评价。曾国藩称赞他说:“其于湖南文献,搜讨尤勤,如饥渴之

于饮食,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以为洞庭之南,服岭以北,旁薄清绝,屈原、贾谊伤心之地,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东起漓源,西接黔中,北汇于江,全省之方輿略备,巨制零章,甄采略尽,为《沅湘耆旧集》二百卷。遍求周圣楷《楚宝》一书,匡谬拾遗,为《楚宝增辑考异》四十五卷。绘《乡村经纬图》以诏地事。详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为《宝庆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冈州志》三十四卷。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名,乃旁求遗书,得五十余种,为校刊百八十卷。浏阳欧阳文公玄全集久佚,流俗本编次失伦,为覆审补辑若干卷。大儒周子权守邵州,录其微言,副以传谱之属,为《周子遗书》若干卷。所至厘定祀典,褒崇节烈,为《召伯祠从祀诸人录》一卷、《朱子五忠祠传略考证》一卷、《五忠祠续传》一卷、《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二卷。呜呼,可谓勤矣!”^① 梁启超也高度评价邓显鹤对湖湘文化的大力弘扬,他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与环境者益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彼全谢山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其乡后辈者何若? 间接影响于全国者何若? 斯岂非明效大验耶。”^② 这次旅途魏源与邓显鹤为伴,一路纵谈,诗歌唱和,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他们以后虽然分处异地,两人仍有密切的书信往来。每当他们各有新著,仍然千里寄赠,相互征求意见,以供改正之参考。魏源就是通过邓显鹤赠送的《船山遗书》和《沅湘耆旧集》而受到以船山学说为核心的湖湘文化的深刻熏陶。道光二十三年(1843),邓显鹤编辑的《沅湘耆旧集》刊刻之前,曾向魏源征求意见,魏源回信说:“承示《沅湘耆旧录》,全书网罗百代,包括全楚,体大思精,不朽盛业,无以复加矣。但鄙意‘沅湘’何以不名‘三湘’? 陶文毅序《资江集》,以谓湘在九江最长且著,必综其首尾核之,而后‘三湘’之名可定。其以潇湘、资湘、沅湘为‘三湘’。论虽创,实确。入湖之水,其大者止此三,非‘三湘’而何若以‘沅湘’为名?

① 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载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6~177页。

②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页。

湘只指长沙一水,不能该资水矣。其实,潇水古人亦不能指定。源谓即以朱子‘三湘’之说推之,蒸湘、沅湘之外,资水亦可当。……不知大雅以为何如?若得椽笔于总叙中发此谊,并改板心为‘三湘’,则更为桑梓增色,并为论古者开拓心胸矣。惟教正之。不宣。”^①从信中不难看出,魏、邓之间的友谊是真挚而坦城的。魏源提出的以“三湘”代替“沅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更高一筹,能够更确切、更全面地涵盖湖南全省的地域文化,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地方特色与精神风貌。道光二十五年(1845),魏源撰写的《圣武记》与《海国图志》正式刊刻出版时,也曾寄赠给邓显鹤求教。他在信中结尾深情地说:“旧雨零落,吾两人相望如晨星,又迢递千里,不知此生尚有合并之日否?道远不能时奉书。”^②可见他们之间友谊的真挚与深切。

魏源来到北京之后,开始了更广泛的交游活动。除了前面提到的汤金钊、胡承珙、姚学塋、刘逢禄、董桂敷、龚自珍等朝廷高官、翰苑文斗、学者名流之外,还结识了朱珔[1769~1850,字玉存,号兰坡,安徽泾县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1807)任山东乡试副主考,寻擢赞善,迁侍讲]、钱仪吉[1783~1850,初名逵吉,字衍石,号新梧,浙江嘉兴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选庶吉士]、胡培翬(1782~1849,字载平,号竹村,安徽绩溪人)、张成孙(字彦惟,江苏武进人)、陈奂(1786~1863,字硕甫,江苏长洲人)、徐璈[1779~1841,字六襄,一字樗亭,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授户部主事]、陈沆(1785~1826,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湖北蕲水人)、李穀(?~1817,字松溪,山西泽州人,秀才)、唐鉴[1778~1861,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选庶吉士]、欧阳辂(1767~1841,初名绍,字念祖,号涧东,湖南新化人)、贺长龄[1785~1848,字耦庚,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以及何仙槎、李双圃、易午亭、陆猷等人。

魏源初次入京,一住三年,主要是靠教书为生。当时左副御史李宗瀚[1769~1831,字公博,一字春湖,江西临川人,嘉庆十二年(1807)曾任湖南学政,后历任太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等职],在任湖南学政期间,对魏源十分了解与器重,此时便将魏源聘请为自己的家庭教师,专门教自己的儿子,“待之甚厚”,解决了魏源在京的吃住问题。魏源之所以能很快名扬京师,结交了那么多政界、学界名流,与侍郎周系

① 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

② 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英的赏识与宣扬是分不开的。据魏源的儿子魏耆说：“周石芳侍郎系英，偶见府君诗篇敦雅，四出揄扬，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争纳交焉。”^①

魏源初游京城所结交的大量师友，绝大部分同魏源保持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诸人：

周系英(1765~1824)，字孟才，号石芳，湖南湘潭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吏、户、兵、工四部侍郎兼署礼部右侍郎，充《高宗实录》总纂官副总裁、咸安宫总裁、《治河方略》馆副总裁、文渊阁直阁、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等重要职务。周系英可以说是“天子近臣”，也是当时湖南人在京城的最高官员。他还多次担任顺天、福建、江南等地乡试的考官或副主考官，以及四川、山西、江西、江苏等省的学政，可以说是“门生遍四海，桃李满天下”，无论在政界、学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魏源一个刚满20岁的青年书生，初入北京，一经周系英的赏识与揄扬，就能“数日名满京师，中朝公卿争纳交焉”。对于这样赏识与推重自己的忘年之交、政界前辈，魏源始终心怀感激与思念之情。道光四年(1824)周系英逝世时，魏源亲撰《户部左侍郎提督江苏学政周公神道碑铭》一文，对周系英一生的道德文章、学业政绩作了高度评价，并在文章结尾的铭文中给予热情赞颂：“帝选宿学，入侍讲幄，公矢其慤。匪夕伊朝，受知两朝，若去在霄。曰汝教督，于汾于蜀，士霄其读。曰汝司衡，于南于京，士春其英。曰汝贰部，司空司马，联肱且股。天鉴其衷，民吁其恫，公褰其躬。……实录手辍，中夜感涕，曰思先帝。弗惩厥前，益矢厥肩，捄民恐遭。手拮口瘖，大灾克苏，士气克桴。庶公其宰，以润四海，曷云不待！公重如山，公粹如璠，万夫之宪。……”^②正是从周系英、严如煜(后面将作介绍)等人开始，在政学两界沉寂将近两个世纪的湖南开始活跃，湖南一批杰出的人才在嘉庆、道光年间逐渐崭露头角。周系英对魏源如此推重，说明他对家乡人才的高度重视与着力培养。这种互相帮助、承前启后、薪尽火传的师生学脉关系，在湖南近代表现得格外明显，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贺长龄(1785~1848)，字耦庚，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这位湖南老乡，曾历任山西学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云贵总

①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8页。

②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7~338页。

督,也是湖南经世致用之“实学”的首倡者之一。他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出任山西学政时,就把魏源延为自己的幕宾,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道光五年(1825),贺长龄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再次延请魏源为幕宾,委托他主编《皇朝经世文编》。此书一面世,就轰动一时,被称为“经国杰作”,士林学子争相购求,“一时纸贵,几乎家荆璧而人隋珠”^①,可以说贺长龄是魏源学术事业走向成功的第一位有力帮助者。

陶澍(1778~1839),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由翰林院编修改御史,历任户科、吏科给事中;道光元年(1821)擢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三年(1823)升安徽巡抚,两年后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加太子少保,升两江总督。陶澍是中国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也是湖南近代第一代人才群体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具有革新思想的政坛显要与学界名流,前者如贺长龄、贺熙龄、唐鉴(均为湖南人),还有非湘籍的林则徐等人;后者如邓显鹤、魏源,还有非湘籍的包世臣等人。他们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陶澍还是后来湘军领袖人物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的亲家,他对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的兴起起了巨大的先导与鼓舞作用,对湖湘文化的弘扬与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魏源初识陶澍大约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第二次入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时。这年夏天陶澍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魏源为他送行,并题《陶云汀庚午出蜀入蜀图》四言古诗五首相赠,在那时就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道光五年(1825),陶澍出任江苏巡抚,已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主编《皇朝经世文编》的魏源有了同陶澍更密切接触的机会,而陶澍“亦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②,从而使魏源得到了参加两江地方高层政府议政、决策的极好机会。从此,两江地区成为魏源参加政治实践、施展政治才华的主要舞台,也是魏源中晚年的主要栖息地与著书立说之地。魏源在两江幕府不仅提出了许多兴利除弊的改革良策,而且为陶澍代笔起草了大量文件、文稿。魏源对陶澍的知遇之恩始终深怀感激之情,对陶澍的功业政绩给予高度评价并作了深刻的理论总结。他在为陶澍编纂的《御书印心石屋文录》所作的《叙》中说:“休养日久,生齿炽而机变滋,人心日趋于利,利出于二孔,则不归于上,不归于民。有救时君子欲纠其弊而还其利,势必不得不出于更革。小更革

① 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页。

②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8页。